

2021·年终专稿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本报记者 刘玲玲 莽九晨 杨一 邹志鹏

西方一些国家选举投票率观察

王振民 李正辉

我们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选举投票率和选举制度研究发现,近年来,投票率下跌已经成为国际普遍现象。与全国性选举相比,地方性选举的投票率尤低,纽约、洛杉矶等金融中心城市的地方选举投票率在20%左右,一些大城市投票率仅为个位数。学者研究认为,投票率与选举的正当性(认受性)没有必然联系,投票率低不一定意味着选举正当性(认受性)低。美国两党近年来在投票率问题上取态相反、斗争激烈,近期的“民主峰会”进一步暴露了美国在选举投票问题上的政治两极化。

事实证明,投票率是西方民主的一个游戏,实质是最终赢得选举、获取政权的工具;投票率高低从来不是其选举的关注重点,赢得选举、维持执政地位才是关键。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没有真正意义的投票权可言,回归前的香港所谓“选举”制度不存在投票率问题,通过操弄选举获取最大政治利益才是英国的目的,企图借此阻碍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实行有效管治。

一、低投票率是近年国际普遍现象

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全球平均的选举投票率已明显下降。以美国为例,其选举投票率近年已下跌至经合组织国家中的倒数几名。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的投票率一般只有40%,而党内初选的投票率一般只有25%到30%。

与全国性选举相比,地方选举投票率通常更低。2021年11月美国纽约市(总人口约800万,与香港相若)地方选举(包括市长、市会议员)中,投票率为24%,在490多万登记选民中,投票人数不超过130万。2017年的纽约市长选举投票率为21.7%。2017年洛杉矶市长选举投票率是20.1%,2013年是23.0%,2009年仅有17.9%。2019年芝加哥市长选举投票率为32.8%。美国南方最大城市达拉斯2015年地方选举投票率只有6%。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近年地方选举投票率大都为约40%。

西方很多地方选举投票率低,其原因往往是缺乏党派竞争,候选人之间观点接近,难以激励选民投票。西方学者认为,除非出现丑闻或重大举措,否则地方政治大多处于“平衡状态”,激发不出选民的投票兴趣。

二、投票率与选举的正当性(认受性)没有必然联系,投票率低不一定意味着选举正当性(认受性)低

美国等国的选举法没有规定任何最低的投票率门槛作为选举成功或者认受性的条件。西方学者认为,无论投票率高低,产生的投票结果不会有什么两样,低投票率不会产生不公平、不公正的选举结果。美国有1.6亿注册选民,如果从中随机抽取的1.6万人刚好能代表全国选民构成情况,那么这场选举就已经有了准确的结果和正当性。对同一个选区,70%的投票率和50%或30%的投票率往往有相同的选举结果;达拉斯市6%的极低投票率也不会被认为威胁到选举的正当性。低投票率的选举并不一定缺乏代表性,而应关注投票率的构成,而不是投票者的规模。不投票也是一种选择,说明那些不投票的选民同意由那些积极投票的选民代为选择政府领导人和代议士。

学者认为,不应为了提高投票率而推动那些无助于实现选举功能的选民投票。对于那些通常不投票或没有投票倾向的人,他们投票可能仅仅因为受到强迫,而与实现选举功能无关,这种情况下,投票率低反而不是坏事。关于投票率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之间的关系,尽管美国选民在地方选举中的投票率远比联邦选举低,但美国盖洛普公司、德勤公司多年调查都显示,美国人对地方政府的信任程度反而长期高于对联邦政府的信任。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地区)遇到重大挑战,面临艰难抉择,才会出现创纪录的高投票率。例如,美国2020年大选投票率(66.8%)创1900年以来新高,就是因为美国面临多方面严重困难。当社会发展平稳,选民对未来有较好预期,没有通过投票来改变政府政策的强烈愿望,对选票就不会看得很重。投票率不高反而表明选民对政府施政和现状基本满意,感到不需要通过选举实现大的改变。

三、美国两党在投票率问题上的斗争表明投票率高低从来不是其关注的重点,赢得选举才是关键

美国民主党一直自称代表基层、弱势群体和劳工阶层,一直致力于提高投票率,降低投票门槛,尽可能把少数族裔、新移民、年轻人等群体都变为选民,并尽可能方便他们投票。投票率越高,民主党获胜的可能性越高。他们指责共和党故意使投票变得困难。共和党人则表示,他们反对投票改革是因为担心选民欺诈,指责民主党让自己的选民自动登记,提高民主党的投票率,而不关心选票的诚信性。61%的美国人认为,如果改变选举规则,使登记和投票更容易,不会使选举更不安全。大多数共和党人则认为,如果改变投票规则,使投票更容易,会降低选举的安全性、可靠性。

特朗普2020年公开指责民主党,称如果实行民主党推动的扩大选民投票的举措,“将永远不会有一个人共和党人在这个国家当选”。实际上特朗普承认了当美国人民更多参与投票时,共和党就会输。他知道压制投票是他和共和党获胜的唯一途径。更高投票率只对民主党是好事,对共和党却不利,共和党只能依靠较低的投票率获胜,因此必须尽力压低投票率。

无论民主党如何想方设法提高投票率,或者共和党如何竭力降低投票率,他们真正关心的从来不是投票率,其最终的唯一目的都是赢得选举。只要能赢得选举,可以不择手段鼓励或者限制投票、提高或降低投票率。赢得选举,取得政权才是关键,投票率必须为此服务。

刚刚结束的“民主峰会”上,美国总统拜登提出“捍卫自由和公平的选举”,大力推动关于投票权改革的法案出台,旨在使投票更容易。这两个法案在共和党人的坚决反对下,一直无法获参议院通过,而共和党控制的19个州的立法机构已经以防止选举欺诈为名通过了限制投票的法律。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认为,在美国,投票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党派分界线,大多数民主党人认为投票是一种权利,而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这是一种特权。皮尤中心调查发现,有3/4的特朗普支持者拒绝接受拜登作为合法的美国总统,他们支持特朗普对2020年大选投票存在广泛欺诈的指控。2021年11月,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研究所首次将美国列入其“民主倒退国家”名单,认为美国民主的明显恶化,表现在对可信的选举结果提出质疑的趋势增加,努力压制选举参与,以及失控的两极化;在没有任何欺诈证据的情况下美国出现对2020年的选举进行暴力抗争,这已经以不同的方式在秘鲁和以色列等地复制。

美国媒体批评:“民主峰会”上拜登的讲话显得异常空洞,拜登并没有为改变国内的民主倒退做出足够努力,美国的民主正处于严重危险之中,而扭转美国国内的民主倒退对于保持美国在国外的民主“领导地位”至关重要;对美国民主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内部,这不是一个美国有资格向其他国家讲授民主的时刻。正如美国投票权组织“黑人选民重要”的创始人所说:“当拜登总统正在主持‘民主峰会’时,我们自己的民主就在这里崩溃。当你无法在国内保护民主时,你不能试图向全球输出和捍卫民主。当你自己的房子着火时,你不可能成为全球消防员和民主义炬手。”

四、在英国殖民统治下,香港没有真正意义的投票权可言

香港最早引入选举成分的公共机构是洁净局(市政局的前身),市政局的选举权范围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非常狭窄,只属于较富有及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士,草根阶层被排除在外。据估计,1979年香港约有44万人符合选民资格,但只有不足3.5万人申请成为选民,而其中更只有不足1/3会参加投票。1981年的市政局选举总投票人数只有6100多人,代表性非常有限。进入20世纪90年代,香港“选举”制度一直并非由香港本土的政治力量所决定,英国等外部势力始终试图操纵香港选举制度。英国在香港殖民统治末期,别有用心地引入和扩大选举,目的是阻碍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实行有效管治,延续英国的政治影响。回归前的香港“选举”制度从来都是西方势力利用的政治工具,通过操弄选举获取最大政治利益。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

着、有实效。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认为,中国积极开展清洁能源国际合作,极大助力实现全球能源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目标。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塔拉斯表示,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援助发展中国家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科学理念指引实践 绿色发展造福民众

“眼中有花、窗外有绿;路景相融、一站一景。”刚刚全线开通的中老铁路,是中老友谊之路,也是一条绿色生态之路。工程成功绕避各类自然保护区核心区和环境敏感点,设置专门的动物迁移通道和防护栅栏,充分保护沿线的亚洲象、热带雨林等资源。

绿色,正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鲜明底色。在巴西,美丽山二期项目跨越巴西5个州、81个城市,为避免让自然保护区,光是塔位变更就有161处,恢复植被1100公顷。在埃塞俄比亚,中国援助的微小卫星帮助当地农林部门及时获取气象、水利等数据,更有效应对自然灾害。在非洲萨赫勒地区,中国理念和技术元素深度融入非洲“绿色长城”工程建设。一个又一个绿色项目助力当地可持续发展,为推进全球环境治理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

截至目前,中国与28个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倡议;“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覆盖40多个国家的150余家中外方伙伴;“一带一路”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纳入100多个国家的生物多样性相关数据,120多个国家的环境官员、研究学者和技术人员2000余人次参加了绿色丝路使者计划;实施“一带一路”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建立“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伙伴关系;大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克里斯·斯塔克说,绿色“一带一路”带给世界的最大好处,就是工业的进步和低碳能源生产成本的降低,整个世界都将从中受益。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科学理念是实践的指引。“生态文明建设并不是说把多少真金白银捧在手里,而是为历史、为子孙后代去做。这些都是要写入历史的,几十年、几百年的历史。要以成功不必在我的胸怀,真正对历史负责、对民族负责,不能在历史上留下骂名。”中国领导人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强烈的责任担当推动和引领生态文明建设,中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美国国家人文科学院院士小约翰·柯布说,谋发展,需要长远地考虑全体人民的未来与福祉,而非一时之利,“而这正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团结合作是必由之路。“要携手合作,不要相互指责;要持之以恒,不要朝令夕改;要重信守诺,不要言而无信。”中国坚定践行多边主义,努力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呼吁应充分重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困难和关切,发达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要多作表率,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能力建设等方面支持。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说,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对各国达成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至关重要,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方面,中国的实践值得各国借鉴。

中国之声,激荡世界;中国行动,广受赞誉。应对气候变化任重道远,但只要各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人类必将能够科学应对全球气候环境挑战,努力把一个清洁美丽的世界留给子孙后代。

年到2017年新增的绿化面积中约1/4来自中国,贡献比例居世界首位。英国《自然》杂志刊文指出,中国拥有平衡经济发展与控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丰富经验,为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了借鉴。

携手并进、共同发展,中国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国际合作卓有成效。中国与俄罗斯、日本等国展开候鸟保护长期合作,同俄罗斯、蒙古国、老挝、越南等国合作建立跨境自然保护和生态廊道。目前,中俄跨境自然保护区内物种数量持续增长,野生东北虎开始在中俄保护地间自由迁移;中老跨境生物多样性联合保护区面积达到20万公顷,对亚洲象等珍稀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形成有效保护……“中国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为全世界树立了榜样。”世界自然基金会俄罗斯负责人德米特里·戈尔什科夫表示。

推进全球气候治理 彰显大国责任担当

数据显示,过去10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10年,全球气温上升了1.2摄氏度。1970年以来的50年是过去2000年以来最暖的50年。气候变化问题日趋严峻紧迫,合力应对气候变暖刻不容缓。

10月31日至11月13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这是《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后召开的首次缔约方大会,会议达成《巴黎协定》实施细则一揽子决议。其间,中美两国联合发布《中美关于在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的格拉斯哥联合宣言》,有效提升了各方合力应对气候变化的信心,积极建设性地推动了大会进程,为弥合各方分歧、扩大共同立场注入了动力。

中国是推动达成《巴黎协定》的重要贡献者,也是落实《巴黎协定》的积极践行者。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将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用全球历史上最短的时间实现从碳达峰到碳中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认为,中国作为拥有庞大人口和面对许多其他社会经济优先事项的发展中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人类最紧迫的议题方面,显示出了巨大的勇气。

4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气候峰会时用“六个坚持”——“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绿色发展”“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系统阐释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理念的核心要义与实践路径。坦桑尼亚《卫报》国际版主编本杰明·麦格纳表示,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决心,增强了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信心。“‘六个坚持’体现了中国领导人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远见卓识和庄严承诺。这些承诺有着详细的目标和计划,令人信服。”

今年1月,中企投资承建的阿根廷赫利俄斯风电项目群罗马布兰卡一期、三期项目正式投入商业运营,该项目群全部投产后预计每年将为当地提供16亿千瓦时清洁电力,每年可让阿根廷减少燃煤65万吨,碳排放减少180万吨;7月,中企承建的哈萨克斯坦图尔古孙水电站实现全部机组投产发电,装机容量24.9兆瓦,多年平均发电量可达7980万千瓦时,每年可减排约7.2万吨;12月,中企投资承建的克罗地亚塞尼风电项目正式投入运营,预计每年可贡献约5.3亿千瓦时绿色电力,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46万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多边合作,大力开发与推广清洁能源技术,通过设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等行动,同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展务实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合作成果看得见、摸得

鼓励更多有实力、有信誉的中国企业赴秘投资兴业,希望秘方提供良好稳定的投资环境,中方也愿进口更多秘特色优质产品。

王毅说,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旨在形成全球合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尽快复苏经济,推动如期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秘鲁是多边主义的积极倡导者,也是发展中国家权益的重要维护者,欢迎秘方支持并参与这一倡议。中方支持秘方担任2024年APEC东道主,愿同秘方共同推动APEC合作取得新进展。

毛尔图亚表示,今年,秘中隆重庆祝建交50周年,两国关系达到新水平。秘方愿深化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快推进自贸协定升级谈判,推动秘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更好发展。秘方将继续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感谢中方支持秘方担任APEC东道主,秘方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高度重视并将认真研究中方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

视频通话,重点宣介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论述,并就深化两党交流互鉴、推动中泰抗疫、经贸、体育合作等交换意见。

保护生物多样性“绿色答卷”举世瞩目

2021年,云西南双版纳亚洲象群成为世界级“网红”。从北移到南返,象群一路走来,中国政府与民众一路精心管护。“人象和谐的画面,温暖了全世界。”以此为主题的短片《“象”往云南》,在10月昆明举行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简称COP15)开幕式上首映,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景象。法国生态学家、弗朗什-孔泰大学教授帕特里克·季洛杜不禁赞叹,云南亚洲象的故事正是中国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案例。

COP15是联合国首次以生态文明为主题召开的全球会议。习近平主席以视频方式出席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强调秉持生态文明理念,共同构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方鲜明提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经济与环境协同共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地球家园愿景,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共鸣和深入思考。

“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地球是人类共同生活和守护的家园,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共同体的血脉和根基。引领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新征程,中方宣布:将率先出资15亿元人民币,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支持发展中国家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构建起碳达峰、碳中和“1+N”政策体系……国际人士称赞,中国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展现的领导力和行动力有助于扭转当前全球生态系统质量下降的趋势。

一组组亮眼数据标志着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大步前行的刻度:“国宝”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大熊猫野外种群数量40年间从1114只增加到1864只;朱鹮由发现之初的7只增长至目前野外种群和人工繁育种群总数超过5000只;亚洲象野外种群数量从上世纪80年代的180头增加到目前的300头左右;在青藏高原,藏羚羊数量大幅增加;“微笑天使”长江江豚频繁现身……“在生物多样性调查和监测、育种保护、保护区规划、应对气候变化等诸多方面,中国已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引领者。”美国野生动物保护专家毕蔚林称赞道。

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中国书写的“绿色答卷”举世瞩目。建立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近万处,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1%的重点野生动植物种群得到有效妥善保护;“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行动倡议,入选联合国“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精品案例;森林面积和森林蓄积连续30年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的国家……卫星图像显示,全球从2000

王毅同秘鲁外长毛尔图亚通电话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12月23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秘鲁外长毛尔图亚通电话。

王毅说,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秘关系始终保持稳定发展势头,走在中拉关系的“第一方阵”。前不久,两国元首就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充分彰显了双方对中秘关系的高度重视和深化友好合作的良好意愿。中方愿同秘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中秘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王毅说,中秘都是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代表,两国合作是相互帮助、相互支持的南南合作,有着巨大潜力和光明前景。中方将继续支持秘方维护主权独立、民族尊严和正当权益,相信秘方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也会继续支持中方立场,巩固双方互信,夯实两国关系的政治基础。

王毅表示,中秘两国团结抗击疫情,续写了友谊新篇章。中方愿

宋涛同泰国国民力量党主席、政府副总理兼奥委会主席通话

新华社北京12月23日电 12月23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宋涛同泰国国民力量党主席、政府副总理兼泰国奥委会主席巴威举行